





的地方,但就创新本身来说,它们都具有哈默指出的三个特点<sup>[1]</sup>:

公共管理

就没必要摸石头。这里可以把桥或路线图比作理论,摸石头比作实践。有理论的指导,实践不一定以摸石头的方式进行。但是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况下,要过河,摸石头不失为一种可以采取的方法。事实上,这里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创新往往是一种摆脱以往惯例的具有想象力的行为。有理论指导的创新固然不错,但理论也有禁锢人的思想的作用,尤其是对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某一时空的产物,它会受到这一时空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究竟如何具体运行,马克思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事实上,我们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还可以看到列宁对管理未来的苏维埃国家的一些比较浪漫的看法。比如列宁认为一个人只要初通文墨、稍具计算知识就可以管理国家了(这显然同苏维埃是一个工人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关)#这是因为列宁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在苏维埃国家建立起来以后,列宁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以至于他在后来提出了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的口号,提出要悬赏两本行政管理的著作。因此,理论需要创新,需要与时俱进。

理论来自于实践,但理论又是超前的,否则它无法具有指导的作用。这表明了两者相同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中国的改革包括政府管理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实践,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提供指导。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其他的相关理论,但必须结合自身的情况加以创建。奥斯特洛姆在谈到理论的必要性时同时指出!用一种设计理论指导另一不同设计理论为基础的体制的特质,会导致深刻的误解。运用一种设计理论去改革以另一不同理论为基础的体制,会产生难以预料的、代价昂贵的结果#[5]

这就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摸索。因此,摸石头过河所体现的实践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在未来,我们或许在某些方面还要摸石头过河。但是,我们不能总是靠摸石头过河,因为摸石头毕竟具有盲目性,摸不到了就得停下来,这里至少有巨大的时间成本问题。此外,再摸到的石头也有可能指引你不是往前走,而是往后走。因此,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产生理论,产生过河的路线图,否则我们或许到不了彼岸,或许最后又会回到此岸,或许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到达彼岸。



知,便是愚蠢,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事实上,我们今天不少政府管理上的改革和创新,正是借鉴了西方的做法,比如公共服务的多元提供、公共服务的市场运作机制、政府绩效预算、政府绩效评估等等。

当然,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必须结合自身的情况,原因在于我们与西方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也不一样,比如一些西方国家早已进入了福利国家阶段,这对于还处在温饱型的中国社会来说,面临的问题是很不相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同样是基于市场经济的政府管理,其管理方式和公共政策都可能存在不一样的地方。比如与西方的一些以市场为主导的管理方式而言,中国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政府主导的管理方式。但是,这一方式也不一定就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这种管理方式或许也会发生变化,正如西方政府在管理的方式手段上随着)“世纪/“年代全球经济一



够解决问题，时间成本和实施成本会下降。但它的问题在于，由于在变革中采用的是大起大落